

第三章

1927 年后的十年征战

抗日战争纪念馆
www.krzzzh.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h.com

一、宁汉对立和二期北伐

1927年4月1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推举胡汉民先生为国民政府主席。同时成立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蒋氏自任主席。

这样，在中国长江流域，形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国民党政权：一为当时尚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影响下的武汉国民政府；一为由国民党右派掌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先已在迁都问题上争执不下的宁汉双方由此更是势如水火，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宁汉双方对峙之际，败退至苏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盘踞在山东的直鲁联军主力于4月中旬乘机大举向我反扑。敌人兵分两路：一路由淮河南下围攻合肥；一路沿津浦路南下，直抵浦口，并以大炮隔江轰击南京。同时，张学良率奉军精锐自京汉线南下至河南驻马店，威逼武汉。鉴于大敌当前，宁汉双方只能暂时罢兵息争，分头继续北伐。

南京方面的军事委员会将所属军队分为三路：西路以李宗仁将军为总指挥，辖第7军夏威部、第15至2师、第44军叶开鑫部、第27军王普部、第10军王天培部、第33军柏文蔚部。该路军渡江西进，直趋合肥，由皖北攻截津浦路；中路军以蒋介石先生为总指挥（白崇禧将军代），辖

第1军1、3两师、第6军杨杰部、第37军陈调元部，第40军贺耀组部。该路军渡江北上，以攻略徐州为第一期作战目标。以上两路，为南京方面北伐之主力；东路军以何应钦将军为总指挥，辖第1军一部、第26军周凤岐部、第14军赖世璜部、第17军曹万顺部，沿长江下游陈兵于镇江至常熟之间，俟西、中两路军进攻得手后，再渡江北上，清剿苏北之敌。

5月初，我所在的中路军由南京西南的马鞍山附近渡江北上。此时敌人主力多集中在津浦线上及合肥周围，故我中路军正面仅发生小规模战斗，很快将敌人击溃，一路经全椒、滁州、盱眙向北挺进，进展神速，于5月20日左右即接近陇海铁路附近。于此前后，西路军亦在柘皋、梁园大败直鲁联军精锐马济部，乘胜攻克津浦线上的重镇蚌埠。西、中、东三路大军遂遥相呼应，齐向陇海线推进。6月2日，我北伐大军攻占陇海、津浦两路枢纽重镇徐州，各路军队胜利会师于陇海路。

在我军攻占徐州的前一天，即6月1日，武汉方面的北伐大军也在重创奉军之后占领郑州，与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国民军会师，随后又乘胜占领开封，奉军被迫仓皇北撤。

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原倾向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向右转。1927年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首脑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赴郑州会晤冯玉祥将军（史称郑州会议）。会后，武汉方面将已占领的河南地盘交给冯氏的国民军，把北伐军队全部撤回武汉地区，一面积极筹划在内部“清共”，一面准备进攻南京。这也就是汪精

卫后来鼓吹的“在夹攻中奋斗”。

郑州会议后，冯玉祥将军又于6月19日在徐州与南京国民政府首脑胡汉民、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张静江等会晤（史称徐州会议）。会议除决定蒋、冯共同对奉作战外，另一个主题便是促汪反共，实现宁汉合流。在南京方面决策层中，当时多数人都赞同继续北伐，而不主张对武汉用兵。

在此期间，南京方面的北伐战事仍在继续进行。6月中旬以后，我们中路军在白崇禧将军指挥下向鲁南临沂攻击前进。

在郯城以南地区，我军曾与孙传芳残部遭遇，展开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敌人初时尚很顽强，硬碰硬地与我们顶着打，我第1军1、3两师在友军配合下由正面不断向敌人发动猛烈冲击，迫使敌人步步后退。双方激战竟日，至午后四时许，我军贺耀祖等部从左翼向敌人包抄，遂使敌人全线崩溃。

此后，敌人再也无力组织有效抵抗，我军长驱直入，直扑至临沂城下。时李宗仁将军指挥的西路军亦相继占领峄县、临城，进迫至邹县、济宁一带，其中叶开鑫部已进至临沂以西地区，配合我中路军猛攻临沂。

临沂城防相当坚固，且有敌人重兵防守，故攻城战役打得十分艰苦。第一日，我军从晨至晚发动十余次攻击，均未奏效，部队伤亡较大。翌日，我军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城，枪炮之声震耳欲聋。激战中，敌人突然出动白俄铁甲车，以炽烈炮火向我攻击部队射击，一度给我军造成

相当伤亡。以后我军集中炮火轰击敌铁甲车，迫使其狼狈缩回城内。战至午后，敌人力渐不支，而我军攻势则愈加猛烈。

正当临沂城旦夕可下之际，上级忽然传下命令，让我各攻城部队星夜解围后撤。我们攻城正攻的兴起，突然听说要把部队撤下来，心中很不情愿。原来，武汉国民政府已命精锐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集中于江西九江，准备顺江而下，东征讨蒋，宁汉局势骤然紧张。南京方面乃被迫将徐海前线主力迅速撤回，以抵御武汉方面的军队。

我第1军3师自前线撤下后，旋经江苏淮阴、扬州，一路开至上海。当时我们心中好生奇怪，既然宁汉武力对峙，我们为何不开往南京，却偏要开到上海来呢？事后始知，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蒋桂之间亦矛盾重重，蒋介石先生此时已暗中酝酿下野之事，故将其视为嫡系的第1军部队置于远离前线的后方，作为今后东山再起的资本。这种内幕当时我们自然是无从知晓了。

部队在上海驻扎半个月后，我突然患病，周身发热无力，精神怠倦，并时常晕厥，实无精力再主持军务，遂向上级呈报了请调报告，不久，何应钦将军调我到南京做他的参议。

这期间，汪精卫已在武汉大举“清共”，促使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第2方面军中贺龙、叶挺两部毅然举行“南昌暴动”，武力反抗国民党政权，宁汉间的紧张局势由此稍有缓和。但南京方面却因徐海兵力空虚，徐州复失。以后蒋介石先生亲自指挥反攻，不料遭到惨败，孙传芳军队乘

机卷土重来，陈兵江北，虎视南京。我到南京时，蒋先生已被迫于8月13日通电下野，东渡日本考察。

此时，南京方面的情形仍十分紧张。武汉唐生智的军队正顺江而下，进至安庆、芜湖一带；江北孙传芳军队自浦口日日以大炮轰击南京城，并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模样。南京军委会急将大部军队沿长江南岸部署，采取防御态势。

8月下旬，孙传芳军队乘我部分沿江防守部队换防，于夜间突然渡江偷袭乌龙山、栖霞山阵地，一度攻占栖霞山主阵地和乌龙山阵地的几座炮台，双方发生剧烈的争夺战。经三日激战，我军始歼灭该处渡江之敌，夺回全部阵地。但与此同时，孙部主力又在镇江、龙潭之间大举南渡，很快攻陷龙潭。我第1军第14师卫立煌部、第2师刘峙部曾就近反攻，一度将敌人逐出龙潭。然而敌人后续部队源源渡江，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此时孙传芳好似输红了眼的赌徒，拼出全部血本，志在必逞。孙部数万大军只携带数日干粮，渡江后即将所有船只调往北岸，以示破釜沉舟之意。孙氏本人亦亲自渡江督战，并扬言要在上海度中秋节，气势甚为嚣张。我第2、14两师众寡难敌，被迫节节后撤，不久栖霞山阵地再次失守，敌人前锋部队一直进迫至南京近郊。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不少市民开始逃出城外。

为挽救危局，南京军委会迅速檄调驻南京及沪杭路的军队准备反攻，总指挥何应钦将军等并亲自赴前线督战，人心由此稍安。

8月29日晚，我驻沪杭路的第1军第1师王俊部、第3师顾祝同部、第21师陈诚部陆续开到龙潭附近，遂会同

第7军、第19军和第1军之第2、22、14师等部于次日拂晓由东、西、南分三路向敌人发动全线反攻。双方十余万军队在龙潭周围方圆几十里地区内搅作一团，枪炮声、呐喊声震耳欲聋，一时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其战斗之惨烈、规模之宏大，为北伐以来所罕见。

战役期间，我一直跟随总指挥何应钦将军左右，时常奉命到前线了解情况、传达命令，故虽未亲身参加战斗，却也目睹了当时这场战役的残酷景象。某次我去前线一个独立团传达何总指挥的作战命令，途中发现在一大片水田里密密麻麻布满了敌我双方士兵的尸体，约有五、六百具。有的尸首已经泡肿发臭，血把田里的水都染成了红色，显然这里发生过一场极为激烈的混战。直到战役结束后，我请假去苏州养病，火车经过栖霞山、龙潭地区时，那一带仍然尸臭薰天，令人窒息，可知在这次战役中死的人是极多的。

龙潭激战持续了近两昼夜，孙军力渐不支，虽数度作困兽之斗，发起一次次凶猛反扑，但均被我军粉碎，全部人马被包围在江岸附近，最后除孙传芳率少数亲随登舟仓皇逃到长江北岸外，其渡江部队悉数被缴械。

是役，我军毙敌万余人，俘敌四、五万人，缴获枪炮不计其数。孙传芳苦心经营多年的本钱，几乎彻底赔光了，从此便一蹶不振。

龙潭大捷后，我军乘胜渡江追击，孙部残余已成惊弓之鸟，望风向苏北逃窜，我军重新光复浦口、扬州等重镇，南京局势遂转危为安。

这时，我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坏。本来我的身体已感不适，龙潭战役期间又冒着酷暑和炮火终日往来奔走于前线与总指挥部之间，病情就更加严重了，只因战况紧急而勉强支持下来。战役结束后，我不得不向何应钦将军请假去治病。当时苏州有一家更生医院，医生都是外国人，据说医疗技术甚好，于是我决定到那里去。

在乘火车去苏州途中经过栖霞山、龙潭一带时，经沿途强烈刺鼻的尸臭一薰，我更高烧、呕吐不止，一到苏州更生医院病情就急剧恶化了，持续高烧达华氏100~105度（摄氏38~40度），医生诊断是癌症。此后一连一个多月，高烧一直未退，茶饭难进，只是头脑却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着清醒。这时我已瘦得皮包骨，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连医院的钟声和人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都使心脏承受不了。左右隔壁病房里的病人，几乎隔两三天就有人死掉，我料定自己也很难从这里活着出去了。想到即将撇下家中的父兄和妻小，以及所熟悉、喜爱的军旅生活，独自漂流到另一个世界去，我的心头难免掠上一股遗憾和眷恋之情，但以后因身体过于衰弱，已无精力胡思乱想了，只好听其自然。一天，一位蓄着浓密的大胡子的外国医生在几位护士的簇拥下来到我的病房，先查看了一下我的病情，随后示意其中一位护士询问我家中都有些什么人，如何与家人通讯等等。我心知病已不治，遂坦然向那位洋医生问道：“大夫，怎么样，是不是我要完蛋了？”他摇摇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不要紧，没关系。”我接着说：“请大夫告诉我实情吧，我是军人，对生死是无所谓的。”他仍旧说没关系，叫

我好好养病，然后率众人走了出去。

又过了些天，想不到我的高烧居然慢慢退下去了，人也有了些精神。以后医生用一种紫光灯在暗室里对我进行照射治疗（双眼用布蒙上），经过几个疗程，周身脱了一层皮，身体却好转起来了。医院里的一些人，包括医生、护士和一些熟识我的伤病员，原都以为我这次必死无疑，未料到我终于从死亡线上熬了过来，纷纷向我祝贺。医院里的护士们都是中国人，知道我是国民革命军军官，都对我加意照料，特别是其中一位姓张的小护士，照顾我更是体贴入微，使我在孤独和病痛中得到很大慰藉。

我在更生医院前后住了三个多月，直到12月下旬才病愈出院。在返回南京之前，我去上海逗留了几日，正赶上蒋介石先生和宋美龄女士结婚，遂出席了他们夫妇的结婚仪式。待回到南京时，已是1928年元旦。

这一时期，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十分激烈。先是，自蒋介石先生下野及龙潭战役后，国民党内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一致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代行中央委员会职权，进而实现了“宁汉合流”，国民党形式上达到统一。但好景不长，原想乘蒋先生下野而独坐江山的汪精卫，因不满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把持特委会大权，愤而重返武汉，另组武汉政治分会，企图依恃唐生智武力反对桂系，宁汉再度对立。与此同时，张发奎亦率第2方面军由江西开回广州，提出“拥汪护党”的口号，反对特委会。不久，汪氏又赶到广州，积极从事倒桂活动。

政治上的分裂导致了军事上的冲突。10月中旬，唐桂战争爆发。不久，唐军即遭败绩，桂系军队占领武汉，当初同样野心勃勃的唐生智被迫通电去职，逃亡到了日本。至11月，张发奎等亦因中共在广州领导起义事件而通电离职，其部继之在五华、岐岭地区为桂军所败。桂系势力由此深入广东，并控制了两湖及安徽等省，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空前强大的派系。

面对桂系专权的局面，以往成见甚深的汪、蒋二人只得暂时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蒋先生于11月上旬由日本回国后，汪精卫即赶往上海与之晤谈多次，共同筹划制桂之计。

我回南京后，对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虽有所闻，但限于当时地位，也难知究竟。况且我身为军人，对政治上的这些争权夺利原本不感兴趣，一心只想上前线带兵打仗，早日完成北伐大业。这时，何应钦将军正率北伐军在津浦路上与直鲁联军激战，并已重占徐州。因此，我向总指挥部提出要去徐海前线，很快获准，随即便上路了。

那时正值战乱之际，后方交通甚为混乱、拥挤。我渡江到了浦口，等了几日也买不到去徐州的车票，后来好不容易通过关系搭上一列向前线运送军需物资的铁皮闷罐货车。同我一样搭车去前线的军人不少，大家都紧紧地挤在几节黑洞洞、气味难闻的车厢里，动都不能动一下。这列货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用了差不多两三天时间才到达蚌埠，此后便不再前行了。我们只好在蚌埠住了下来。两天后，我又设法搭上往徐州运送军粮的敞篷卡车，继续赶

路。此时正值严冬，寒风凛冽，我大病初愈，身体尚很虚弱，更是格外怕冷。由于卡车上装满粮食包，坐在上面毫无遮掩，车子行驶起来，寒风扑面而来，刮在身上犹如刀割一般，冻得我瑟瑟发抖，苦不堪言。一路勉强熬到了徐州。

这时，前线战事已暂时沉寂下来，敌我双方都在加紧调整部署，准备下一步的决战。我报到后，上级即委派我担任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徐州警备司令是第13军军长夏斗寅。夏氏生得粗壮肥胖，貌似一粗莽大汉，内中却颇有心计。平时他不大过问军务，诸事均由其部下一张姓师长代理。我去后，夏氏外表十分客气，但实际上并不让我插手一切事务。我那时虽然年轻，又是第一次在这些杂色部队中做事，但也深知其中情形复杂，故而言行十分谨慎，因此同夏氏等人倒也始终相安无事。

1928年2月上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会议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谭延闿先生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复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次全会使蒋先生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打破了一个时期来桂系专权的局面。我们起初尚为蒋校长的东山再起而高兴，以为国民党内由此将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完全是一个空洞的幻想。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过不久，蒋介石先生亲到徐州视察。当时我原来的老上级、第9军军长顾祝同将军正拟成立新兵教导团，乃当面向蒋氏请求调我担任教导团团长，

蒋氏当即允准。我在夏斗寅那里正百般无聊；对于这项新的任命当然十分高兴，此后便专心在徐州以北的九里山地区训练新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这支新兵队伍果然十分出色。某次蒋先生在九里山地区检阅军队，发现第9军教导团动作迅速、部伍严整，不禁大为赞许，特别对我进行了口头嘉奖。

1928年4月初，国民政府命令所属四个集团军分路进攻奉系军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以期一举完成北伐。具体部署大致是：蒋总司令指挥第1集团军（何应钦将军代）沿津浦路北上，经泰安、济南、沧州而直捣天津；冯玉祥将军指挥第2集团军（原国民军）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攻击前进，配合友军会攻京津；阎锡山将军指挥第3集团军出师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

此时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之流败局已定，尽管他们的外国主子从中干涉亦无济于事。5月底，我第4集团军占领保定，直扑北京。第1集团军稍后亦占领沧州、德州。第2、3集团军均进展顺利，正分别向怀来、固安、河间挺进。

孙传芳自知大势已去，遂于6月3日通电下野。张作霖也于孙氏下野的次日，乘火车出关。火车行至其老巢奉天（即沈阳）郊区皇姑屯时，为日军预埋的地雷炸翻，张氏伤重而死。张氏死后，其子张学良率军陆续撤出关外，我第3、4集团军于6月11日同时进占北京城。不久，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残部数万人亦在滦东地区向我军缴械投降。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反动军阀，终于被一一消灭掉了。

至此，国民政府已在形式上统一了除东北外的全国所有地区（东北张学良将军此时也派代表入关与国民政府磋商东北易帜问题），乃于6月15日正式宣布北伐成功，“统一告成”。

我因奉命留在后方训练新兵教导团，未参加北伐战争的最后战役。当北伐成功的喜讯传到后方时，我们无不欢呼雀跃，兴奋万分。殊不知由于国民党改变了性质，北伐成功并未使中国从此走上和平、富强的道路。相反，无数北伐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仅是旧政权的更替，中国的现状依旧是换汤不换药。此后，由于新的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争斗的加剧，带给人民的是更加深重而频繁的战祸和灾难。

二、讨桂、讨冯、讨唐战争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于1928年8月上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除了推选蒋介石先生、谭延闿先生分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外，另外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以便裁减全国军队。

这次会议开过不久，军队开始进行整编。我的教导团很快就被裁减掉了。部队名为裁减，实际上是把队伍编散，将士兵补充到其它各个部队中去。所以这种“裁军”，不过是仅仅削减部队番号而已，完全是掩人耳目的手法。

教导团编散后，我在蚌埠赋闲无事。自我投考黄埔军校以来，仅第一次东征战役结束后曾回乡探亲一次，一直与家人疏于联系，不免思亲心切，趁这个机会，我派人将在湖南家乡的老父和妻儿接到蚌埠团聚。一家人久别重逢，十分欢快。

是年冬，我又接到新的任命，担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团长（该团即原我曾任过团长的第3师第8团）。第2师为军队整编后的新番号，是由原第3师、第14师合编而成的。名为一师，实际上仍是过去两个师的规模。

当时第2师师部设在蚌埠，我团驻于距蚌埠西北近二

百华里外的宿县，以后又调到蒙城、阜阳，一面训练，一面清剿当地土匪。我的家眷则留在蚌埠居住。

在此前后曾发生过一件事情。某次第2师第4、第5旅在蚌埠附近举行对抗演习，不慎发生实弹射击事件。蒋介石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将两个旅长全部撤职，另外换上黄埔军校毕业生楼景越、黄杰分任第4、第5旅旅长。事后有人悄悄议论，说原来的两位旅长均非黄埔系出身，不是蒋氏的嫡系，蒋这样做不过是寻机借题发挥，以便排除异己罢了。是否真的有此内幕，我始终不得而知。

这一时期，东北张学良将军已正式宣布易帜，服从中央，国内局势表面上一度比较平静。但实际上，围绕着军队“编遣”问题，国民党内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愈演愈烈。蒋先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力图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要求其它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属中央”。冯玉祥、李宗仁等则千方百计地予以抵制，致使1929年元月召开的军队编遣会议不欢而散，未能解决任何问题。随着矛盾的不断尖锐，终于导致了蒋桂战争首先爆发。

蒋先生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的芥蒂由来已久，对他1927年8月受桂系排挤而被迫下野一事，尤耿耿于怀。这一时期，李宗仁将军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桂系另一首领黄绍竑留守广西，一向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先生（李氏亦是广西人）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将军则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屯兵唐山。桂系势力的迅速扩张，使其力量 and 影响超于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之上，成为蒋先生的唯一劲敌，故而蒋氏必欲先去之。

而后安。

为了制桂，蒋先生曾暗中运送军火接济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所部第2军，意在借此牵制桂系，并在将来蒋桂间战事发生时，使鲁部切断武汉与两广间的联系。桂系亦早有牢固控制湖南，使两湖与两广联成一片的企图，故获悉此事后，即于1929年2月，迳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务，另委倾向桂系的何健为省主席，并出兵进攻长沙。

湖南问题发生后，蒋先生一面加紧准备讨桂战争，一面假借请李济深先生从中调处名义，将其诱至南京，软禁于汤山。同时秘密派早已下野的唐生智去唐山策动其被桂系西征时改编的旧部驱白，迫使白崇禧只身转辗逃回广西。俟上述措施完成后，南京国民政府即于3月25日正式下令讨桂，蒋先生亲自乘兵舰指挥大军沿长江两岸浩浩荡荡向武汉进击。

我所在的第2师和第1师等部队在刘峙指挥下（实际负责指挥的是顾祝同），继由蚌埠等地出发，沿长江北岸向西经太湖、宿松、蕲春直捣武汉；在长江南岸的中央军则由南京出发，经芜湖进入江西境内。

我江北部队进至蕲春时，忽闻桂军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先后率部临阵倒戈，驻守武汉的桂军高级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被迫仓皇放弃武汉，率军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我军乃兵不血刃地进占武汉三镇，并继续追击，包围逃往鄂西的桂军，迫使其全部缴械。至6月初，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下野，蒋桂战争最终

以桂系的迅速失败而告终。

战事结束后，我第10团等部先后驻于平汉路上的广水、花园等地，师部则设在汉口。不久，我的家眷亦由蚌埠移居武昌。

蒋桂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蒋冯战争又迫在眉睫。冯玉祥将军所部第2集团军，当时占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域虽然广大，但多为贫瘠地区。一向认为在对奉作战中出力最大的冯氏对此已不满足，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又将河北及平津两市划归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治理，这就更引起了他的极度不满。在1929年的军队编遣会议上，蒋冯二人针锋相对，其矛盾已不可调和。所以，桂系失败后，冯玉祥积极调动军队，并令部下通电讨蒋，战争一触即发。

蒋先生仍然采用以内部瓦解对手的老办法，暗中收买冯氏手下人将韩复榘、石友三等。1929年5月，正当冯玉祥整军备战之际，韩、石二人突然宣布叛冯，服从“中央”。此二人均手握重兵，他们的叛变给冯氏打击沉重，无奈只好含恨下野。

是年10月，冯玉祥在阎锡山支持下重竖反蒋旗号，命其部下将领宋哲元等通电反蒋，随即兵出潼关，攻入河南。南京方面亦急调大军应战，蒋冯战争终于爆发。

第2师接到作战命令后，星夜由蚌埠陆续开抵郑州西南之登封地区（时第2师已移驻蚌埠），师部设在登封以东约八十华里的密县，我率第10团作为师预备队亦驻扎密县，同时担负师部警戒任务。

这时，友军方鼎英部和第2师一部正在临汝城下与冯军激战。不久，师部命令我团火速向前增援，我即率部以强行军速度向临汝进发。由密县至临汝，一路上都是群山峻岭，道路崎岖难行，所幸本团自徐庭瑶将军任团长时就善于山地行军作战，故行军速度甚快。按当时规定，部队行军一小时可小休息一次，但本团官兵一走便是两三个小时，很少有人掉队，与本团一起行军的还有第三师工兵营，由于我们行动太快，他们只好远远地落到了后头。事后该营营长邱清泉见到我，连连竖起大拇指称赞。邱氏是黄埔二期毕业生，其人一向颇为自负，轻易不肯服人。但经此事后，他对我十分客气、尊重。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曾同在第五军共事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处亦很融洽。

待我们赶到临汝附近时，敌我双方正在该城周围打得热火朝天，副师长黄杰（黄杰此时已调任第2师副师长）等都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我这一团人未及休息便奉命投入了战斗。

我们在临汝与敌军激战了数日，不久对方突然弃城而走，紧接着在郑州方面的冯军也纷纷向陕西方向溃退。原来，冯军起事之初，在山西的阎锡山曾许诺联合出兵反蒋。岂知仗一打起来，一向以处世圆滑、工于心计著称的阎氏居然按兵不动，袖手做壁上观，企图坐收渔人之利，致使冯部孤军作战，士气大受影响，再加上冯军将领间意见不和，指挥混乱，遂在中央军打击下全线溃败，于11月仍旧缩回潼关以西，讨冯战争乃告结束。

讨冯战争后，第2师重新开回武汉。在武汉刚刚驻扎

了一个多月，又传来唐生智在郑州举兵反蒋的消息，我们遂又奉命乘火车经平汉路开入河南作战。此时连日天降大雪，铁路交通时断时通，我军只好走走停停，行动甚慢。待我这一团官兵到达河南信阳时，前线各路中央军，已在驻马店、漯河一线将唐军击溃。我们乃中途折返平汉路南段的广水、花园一带驻扎，临近元旦时再移驻武汉。岂知我们在武汉席不暇暖，石友三又在安徽发动反蒋战争，一直进逼到浦口，南京震动。第2师奉命紧急调往南京，拱卫京都。我们到达南京时，石部又已被击退，我们乃循津浦路展开追击，一直到蚌埠才停下来。

在讨唐战争和击退石友三部的同时，于蒋桂战争中被蒋先生重新起用为师长的张发奎与驻广西的桂军联合，打着“护党救国军”的旗号，进攻驻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等部粤军。南京国民政府派何应钦将军率军援粤，在广州附近花县一带大败张桂联军。这是第2次蒋桂战争（亦称粤桂战争）。

自1929年初起，直到这年年底，国内政局动荡，战乱迭起，相继发生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和粤桂战争。我们东征西讨，几乎终日马不停蹄、备尝军旅之艰辛。中央军虽然分别在上述战争中迭获胜利，但国民党内和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未因此而稍减。相反，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迅速酝酿爆发。

三 中 原 大 战

在1929年发生的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间的多次混战中，桂系、西北军（冯玉祥军队长期驻扎西北，故亦称西北军）、唐生智部或元气大受损伤，或全军覆没，相继失败。一向在南京“中央”与桂系、冯玉祥等之间纵横捭阖的阎锡山，实力和地盘却一天天地扩张，一时成为各派反蒋势力所瞩目的人物。老奸巨滑的阎锡山看到桂系和西北军等势力均被分化、击败，自知他必定是南京方面下一个将要打击的主要目标，乃一改以往骑墙观望、鼠首两端的圆滑态度，俨然以反蒋势力的总首领自居，联合冯玉祥等反蒋势力共同倒蒋。

为此，阎锡山一面释放了曾为其软禁的冯玉祥将军，表示愿与冯氏真诚合作，坚决反蒋，并与穷促于广西一隅的桂系军队及川、黔、湘、豫等省的各派军阀暗中联络，以作呼应；一面积极拉拢政治上失意的汪精卫和穷途潦倒的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政治力量，一时结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反蒋大联盟。

1930年3月中旬，冯、阎、桂三个军事集团的五十余名将领，由鹿钟麟将军领衔发出反蒋通电，要他“以党政还之国人”。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

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分任副总司令（张氏实际上并未就职），阎、冯并分别在石家庄、潼关设立总司令部，积极筹划军事。

阎、冯等人此次举兵起事，志在一举推翻蒋介石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统治地位，故均不惜动员各自的全部兵力，拼出所有资本来准备投入战争。南京方面为了应付反蒋联军的联合挑战，也迅速进行了全面的作战动员和部署，整个中原地区一时战云密布，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爆发在即。

当时反蒋联军总的作战方略和军队序列是：以攻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编阎锡山的晋军为第3方面军，担任津浦、陇海两线进攻主力；编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2方面军，主力集中于平汉线作战；编桂系军队为第1方面军，由李宗仁指挥，出兵湖南，进趋武汉；编原驻扎在河南新乡地区的石友三部为第4方面军，由鲁西南之济宁，配合晋军进攻济南。此外，还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等为第5、6、7、8方面军总司令。其总兵力达六十余万人。

中央军的军事部署则是：以韩复榘为第1军团总指挥，率部驻守黄河南岸，阻击沿津浦路南下之晋军；刘峙为第2军团总指挥，所部由徐州、砀山、宿县沿陇海线向西进攻；何成濬为第3军团总指挥，驻守平汉线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在马鸿逵部配合下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一带，监视石友三部行动。此外，另以杨虎城、范石生等部分守南阳、襄樊一带。中央军方面总兵力亦在

六十万人上下。

由于陇海路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两路是它的两翼，在战略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双方都将陇海路作为争夺的中心。中央军在这个区域先后投入了顾祝同、蒋鼎文、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张治中、叶开鑫等部十余个师的精锐部队。晋军亦将战斗力较强的孙楚、杨效欧、关福安三个军及大量炮兵使用在陇海路方面，同时西北军劲旅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及郑大章的骑兵集团军也加入了这一方面的作战。

5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总攻击令。我第2师（师长顾祝同）奉命由蚌埠紧急开往徐州，抵徐州后部队未及休息即会同各友军沿陇海路及以北地区向西快速推进。部队开至砀山以西地区时，与沿陇海路向东攻击前进的晋军先头部队遭遇，由此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战争初期，中央军士气甚盛，加上有空军配合作战，对正面之敌连续发动猛烈攻势。经几日激战，敌人招架不住，节节后退，我军一鼓作气攻占陇海线上的战略重镇归德（今商丘）。这时，原依附阎、冯作战的刘茂恩部突然临阵倒戈，使晋军大受顿挫，其整个右翼阵线发生极大混乱，中央军乘势相继占领了宁陵、睢县、民权等地，并一直追击至兰封（今兰考）附近。

中央军初战得胜，使蒋介石先生大为高兴，他亲自赶到归德指挥督战，企图一举将陇海路正面的晋军打垮。但晋军迅速调整了部署，并增加了一个军的兵力，凭借事先构筑好的坚固工事，在陇海路上的兰封南北一线顽强固守，

我军数度猛攻不克，双方遂演变为阵地战。

当时，本团与敌人相持于陇海路以北之大、小毛姑寨一带。我们占据了大毛姑寨，与对面敌人占据的村寨同在黄河故道上，彼此相距极近，我的团部距对面敌人的指挥部顶多也不过千余米，敌人的步枪都可以打到我的住处，一些官兵常常遭到对方的冷枪袭击。有次我派卫兵传达命令，刚一出门即被敌人枪弹击伤。

起初，我拟乘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击破当面之敌，乃命令部队发动猛烈进攻。但敌人工事相当坚固，还有炮兵的火力支援，使我部进攻接连受挫。激战不到两日，本团第1营营长钟文璋（黄埔二期毕业生）、第3营营长何章（黄埔三期毕业生）相继阵亡，部队损失了百余人。我见攻击一时难以奏效，只好将部队撤了下来。

晋军向以擅长防御作战著称，部队行军到一地，哪怕只宿营一夜，也要认真修筑工事。而中央军以野战见长，缺乏打阵地战的经验。最初本团据守大毛姑寨时，官兵们在阵地上挖了些浅浅的土沟便算是工事了，更谈不上有什么纵深防御，与对方修筑的坚固工事相比，相差甚远，故在敌人的强大火力袭击下伤亡较大。以后我让部队学着敌人的样子认真修筑工事，情况才有所改变。此外，我军也不惯于夜战，夜间敌人常派小分队过来骚扰，向我方阵地上丢手榴弹、放冷枪，我军官兵一听到敌人的动静就惊慌起来，盲目地还击，有时机关枪整夜响个不停，弹药消耗很大。为此我严令各营夜间不准随便打枪，以免自相惊扰，同时控制弹药消耗。

本团在大毛姑寨与晋军相持约一个星期之久，以后奉命换防，驻守位于大毛姑寨东南仅半华里外的堤头村。这个村寨座落在旧黄河故道的堤坝上，故而得名。

在堤头村，我们又与敌人对峙了很久，这期间双方虽互有攻守，但一时谁也难以占上风。整个陇海路方面的战事，都处在胶着状态中。

那时已是夏季，天气很热，加上连日鏖战，身上汗水与泥土混在一起，痒得难熬。一天晚上，我见战事稍平静，便命勤务兵烧了些水，痛痛快快地擦了个澡。洗毕，周身感到舒服无比，竟不知不觉在团部昏然睡去。大约次日凌晨二、三点钟，阵地上突然枪声大作，而且愈来愈近，我大惊而起，顾不及穿上外衣便提枪奔出门外。这时团部特务排的士兵们也纷纷围拢来，我立即带上他们迎着枪声最密集的方向扑去。向前跑了不远，就发现队伍已经垮了下来。我一眼望见第2营营长李天成（黄埔三期毕业生）也慌慌张张地混杂在溃兵中往后撤，立刻大声喝问：“李营长，你怎么也往后跑？赶快给我把队伍带回去！”

李天成猛地听到我的声音，不由一怔，见我态度严厉，也很镇定，才停住脚步，转身收拢部队向回反击。我率特务排抢占了前方一处高地。这时大批敌人正向我们冲杀过来，同时听到左右两翼友军阵地上也响起了急骤的枪炮声，立即意识到这是敌人的全线夜袭。此时部队一旦发生溃败，则必危及全局，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紧要关头，我顾不得躲避迎面飞来的密集枪弹，站在高地上指挥部队猛烈抵抗敌人。特务排的士兵见我整个身躯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

急得大喊：

“团长，你太危险！快卧倒，快卧倒！”

见我不动，几位士兵扑过来要拉我下去，均为我严厉制止了。周围官兵看到我临危不惧，亲冒敌人的炮火，站在高地上指挥作战，军心渐渐稳定下来，经过几次反冲击，终于将正面的敌人全部打了回去。

我刚刚把本团阵地稳定下来，又发现大批接替本团防守大毛姑寨的本旅第11团的官兵们，也纷纷溃退下来，急命特务排士兵一字排开，将这些溃兵堵截住。过了一会儿，该团团长王仲廉才衣冠不整、满头大汗地赶来了，我迎上去说：

“王团长，你的队伍都在这儿，赶快带回去吧！”

王仲廉朝我挥挥手，也顾不上向前道谢，马上组织部队反攻，将大毛姑寨重新夺了回来。

天明时，师长顾祝同将军派一名作战参谋到本团询问情况（电话线已为敌人切断），见本团阵地寸土未失，才放心而去。

在夜间的战斗中，驻守陇海铁路及以南地区的我师第4旅阵地也一度溃败，幸被及时恢复，全师战线才算稳定下来。

不久，蒋先生为了打破陇海路方面两军长期胶着不动的局面，特抽调精锐的第11师陈诚部由陇海路南侧疾进，突击晋军右侧背，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阎、冯见情形不妙，一面命令孙良诚部就近抵抗，一面急派吉鸿昌部从杞县方面加入攻击。陈诚部寡不敌众，几度为敌人包围，经

十余日血战，才突围而出，节节后退。陇海路方面敌军乘势进攻，中央军全线为之动摇，被迫撤至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一线。

在撤退途中，本团在一个叫做野鸡岗的地方，又遭到敌人的一次夜袭。那天也是在黎明时分，我们都在熟睡中，忽被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惊醒，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跃而起，迅速拿起武器迎敌。这时敌人已穿过紧靠着本团宿营地的黄河故道堤坝，正密密麻麻地向我们扑来，压迫我警戒部队节节后退。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官兵们都比较镇静，没有再出现惊慌混乱的情况。我一面集中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抢占有利地形，以炽盛的火力压制敌人；一面指挥各营向敌人实施逆袭，不到一个钟头光景，就将敌人全部击退，并俘获了一批敌人仓皇撤退时遗下的伤兵和枪支弹药。事后始知，与本团相邻的一支友军，不知何故于夜间悄悄调走，敌人乃乘虚穿越其防地，向本团发动突袭。幸本部官兵临危不乱，能沉着应战，使敌人之目的不能得逞。

我军撤至新的预定防线后，第2师负责防守民权县南北之线。我这一团奉命坚守县城以北的一段阵地。因这一带都是平原，不易防守，故顾祝同将军特命工兵营预先在这里修筑了较强固的堡垒式工事。

我军进入新阵地不久，尾随而至的晋军即向我各阵地发动猛烈攻击，民权县城一度为敌侵占，以后虽很快被夺回，但一时引起较大的混乱。蒋先生闻讯十分震怒，下令枪毙了防守该城的本师第8团团长。其人被枪毙后，由我团副团长陈应龙（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调升第8团团长。

在陇海线激战的同时，蒋先生为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援，命令部署在平汉线上的第3军团发动进攻。该军团以一部包围临颖，并向许昌进逼，坚守许昌的敌第8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于作战中阵亡。阎、冯急调孙连仲、赵承绶、高树勋、葛运隆等部驰援，冯玉祥将军并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

我方第3军团所属人多为杂牌部队，各部彼此观望，各图保存实力，并不肯全力作战。这时，桂军已大举攻入湖南，相继占领长沙、岳阳，武汉震动。阎、冯军队乘机在平汉线发动全线反攻，第3军团各部抵敌不住，纷纷溃败，退至漯河一线与敌对峙。以后，蒋先生命陈铭枢的第19路军由广东攻入湖南，占领衡阳，威胁桂军后路，并重创桂军，迫使其全师退回广西，平汉线上的第3军团才免于腹背受敌。

中央军方面于陇海、平汉两线相继失利之际，津浦线上的战况也颇不妙。晋军傅作义部六个军及大量炮兵（以后又有晋军张荫梧部两个军和炮兵两团加入津浦路方面作战）在山东境内全力向韩复榘的第1军团进攻，压迫韩部不断向胶济线方面后退，很快占领济南，并控制了济南至大汶口铁路沿线。这时，韩复榘部主力退至高密县一带与敌相持，马鸿逵、夏斗寅等部则坚守曲阜、兖州等城，情形危急。

鉴于津浦线方面的得失关系全局，倘敌人在此方面得手，则可乘势夺取处于陇海、津浦两线枢纽的战略重镇徐州，截断陇海线上所有中央军的后路，一举导致我军全线

溃败。为此，蒋先生不得不下决心在陇海线方面继续收缩部分阵地，缩小正面，抽调出陈诚的第11师等部急向津浦线增援，以确保后方徐州的安全，并准备向济南反攻。在这稍前，在广东的第19路军也奉调北上增援津浦线作战。

津浦线上的中央军得此生力军增援，士气复振，先将围攻曲阜、兖州之晋军击退，随后于7月底在刘峙指挥下发动全线反攻。经十余日激战，晋军大溃败，各部争相狼狈北逃，中央军于8月中旬收复济南。

反蒋联军为了挽救津浦线方面的颓势，曾于8月上旬，以西北军为主力，在陇海线上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即当时有名的“八月攻势”。敌人的战略企图是攻取徐州，打通陇海、津浦两路，与津浦路方面的晋军会师，迫使中央军在大江以北无法立足。为此，西北军集中孙连仲、孙良诚、吉鸿昌、宋哲元等大部精锐及郑大章部骑兵，发动全面猛攻。

西北军的进攻最初急如暴风骤雨，很快在中央军的防线上打开几个缺口，迫使陇海路以南的中央军部队纷纷后撤，退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亳县（该城原为孙殿英部占据，孙部突围后为我军控制）等城。幸得此时连日天降暴雨，河水泛滥，西北军补给不济，攻坚作战亦困难，而且晋军方面进展迟缓，配合不力，才迫使其将进攻停顿下来。敌人在陇海线方面的作战目的乃告失败。

在陇海线以南战事吃紧时，本团奉命由原阵地撤下来，调往商丘以南稳固阵地，阻挡西北军的攻势（原阵地由教

导第2师汤恩伯旅接防)。经过三个月的厮杀，部队伤亡很大。此时我这一团人除了一个迫击炮连还算基本完整外，其他各营均只剩下百余人左右了。本团于某日夜晚刚刚抵达目的地，便与路过此地的孙连仲部队遭遇，激战一夜，天明又奉命匆匆撤出战斗，乘火车改往津浦线方面增援。我们在兖州下车，马不停蹄地徒步急行军几天，尚未赶到前线，即闻津浦线方面的晋军已完全溃败，遂又奉调回陇海路方面作战。

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攻势失利后，已成强弩之末，战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时津浦线方面的晋军在中央军追击下溃不成军，伤亡惨重，仓皇撤至黄河北岸。蒋先生遂将津浦线上的大部中央军精锐部队转移至平汉、陇海两线作战。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蒋先生将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意在威胁陇海线反蒋联军的后方，并袭扰陇海路西段，以截断西北军的退路。为此，蒋先生下令中央军在平汉线以西分路向登封、洛阳挺进，斩断西北军退回陕西的通道。同时，另以第11师陈诚部和夏斗寅师为一个纵队，由西华、鄆陵和临颖、许昌的中间地带向北疾进，直插平汉线上西北军主力张维玺部侧背。该纵队进攻得手后，蒋先生为扩大战果，又迅即抽调我第2师顾祝同部、蒋鼎文师及第19路军由陇海线以南，经宁陵、睢县、通许、尉氏绕至长葛，一举切断平汉路。我军开至长葛时，张维玺部因腹背受敌，已被迫从许昌越过长葛向北退却，我师即会同友军猛烈追击，将张部几万人军包围在新郑一带。

在反蒋联军方面战局急剧恶化之际，西北军主帅冯玉

祥将军仍企图在郑州背城一战，借以挽回败局。因而他仅派少数兵力防守郑州至洛阳、潼关的交通线，而以大部主力布署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配合下与中央军一决雌雄。

但时局的变化使冯将军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完全破灭了。9月18日，在东北静观风向半年之久的张学良将军终于发出拥蒋通电，并派东北军主力分路入关。此举在反蒋联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刚刚在北平由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和阎、冯势力拼凑起来的“国民政府”匆匆迁往太原，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阎锡山对这场战争早已丧失信心，为图自保，他置西北军于不顾，命令自己的军队拼命逃回山西。晋军在撤退途中，一部为中央军追歼，一部为东北军收编，残部狼狈不堪地退入山西境内。晋军撤走后，西北军顿成孤军。时中央军已攻至洛阳附近，切断西北军退路。冯部官兵见大势已去，军心愈加涣散，被我第2师等部包围的张维玺部率先缴械投降，随后在郑州附近的人军亦纷纷退往豫北。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27日占领西安，西北军全部崩溃，大部向中央军投降，一部被东北军收编。至此，中原大战以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终。

历时七个月之久的中原大战，双方共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在一千多华里的广阔战线上反复厮杀，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战争之残酷，为民国以来所罕见。战争的结果是，阎锡山率残部龟缩山西，桂军遭重创后退回广西，而冯玉祥将军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则全军覆没，从此都失去了问鼎中原的资本。

作为这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回首这一段往事，深感

这场战争纯属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其结果并未给国家带来任何益处，不过徒使人民为此蒙受了极其惨重的灾难和牺牲。我曾亲眼看到，大战过后，中原地区满目疮痍，赤地千里，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饥寒号泣，惨不忍睹。

战争结束后，第2师在郑州附近驻扎了几天，随后开到潼关休整。这期间，我突然接到妻子覃氏病故的噩耗。当时我的部队正待向潼关开拔，却收到堂侄郑康侯派人送来的一封急信，信中说他已奉派到许昌任县长。我的兄长也特地由武昌赶到许昌，要我前去，有要事相告。我不知何事，急忙乘火车去许昌与兄长会面。因我在前线作战半年多，一直无暇与家人联系，故见面后，简单寒暄几句，便焦急地一一询问起家中情形。兄长只顾埋头吸烟，回答我的问题时支支吾吾，一付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见状心中颇生疑窦，一再追问不已，兄长无奈，只得叹口气说：

“么弟，我此来有一事说与你，你务要挺得住呀。”

我预感到家中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有些紧张地说：

“哥哥，你有话直说无妨。”

“么弟，为兄对不住你，我没有照顾好家里。”兄长突然掩面大哭：“弟……弟妹已在8月份患伤寒症故去了！”

对妻子的死，我精神上毫无准备，兄长的话犹如惊雷击顶，我眼前一黑，顿时昏厥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兄长和康侯一家人正围在床边哭泣。

我心中悲痛万分，想覃氏与我结婚十余载，彼此始终

和睦相待，礼敬如宾，相互从未曾红过脸。她虽系一中国旧式妇女，亦无文化知识，然其性情谦和，端庄贤淑，深明事理，素为我所敬爱之，岂料今日却早早抛下儿女，离我而去，思之岂能不心碎。

此后一连多日，我的心情都异常难过，随即向上级请假，与兄长一起回到武昌家中，看视了先妻的灵柩，并安顿了家中诸事，一个多月后方赶回部队。

岂知祸不单行。次年春，我父与兄护送覃氏灵柩回石门，准备在家乡安葬。船至湘西津市停泊，船主趁兄长下船会友，勾结土匪前来劫掠，竟将我父杀死。数月之间，两位亲人先后弃世，消息传来，我大恸欲绝，悲痛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四、平定石友三叛乱及宁粤对立

中原战争结束后，南京中枢以华北军政悉委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负责，所有晋军、西北军及石友三的军队皆归张氏节制整编。

中原大战期间，西北军全军覆没，晋军大部被消灭，惟石友三部未受损失。当战争进行到最后紧要关头时，这个以“倒戈将军”著称的军阀见形势对反蒋联军方面日趋不利，遂又故伎重演，暗中与中央军接洽，率部队由开封以东的贯台渡口北渡黄河，退到新乡、彰德、顺德之线，脱离了战场。大战之后，石友三占有河南省南部和河北省北部三十余县地盘，招兵买马，就地筹饷，雄踞一方。岂知他自恃手握重兵，不甘久处顺德等一隅之地，企图北上进取平津，称王华北。为此，石氏暗中与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刘桂堂两部及晋军残部勾结，又与在山东的韩复榘联络（后为韩氏拒绝），阴谋起事。经过一番准备，石友三于1931年7月19日发出讨张通电，挥军沿平汉路北上大举进攻平津。

对于石友三的不轨图谋，南京中枢先已有所闻，故石氏作乱不数日，国民政府即正式下达讨伐令，命令刘峙将军指挥我所在的第2师顾祝同部，以及刘镇华、王均等部

沿平汉路北进，追蹙石部，期与东北军南北夹攻之。

战事之初，东北军于平汉线各点节节后撤，石友三部经内邱、元氏，未经人的抵抗即于7月23日占领石家庄。石友三此时踌躇满志，愈加轻视东北军，以为平津指日可下，遂指挥所部渡过滹沱河，继续沿平汉线向北推进。28日，石部与在望都、保定之线严阵以待的东北军主力于学忠部相遇，发生激战。石友三军队虽一度突破东北军中央阵地，前进至距保定仅二十五华里地区，但东北军迅速增调援军堵住中央缺口，与敌相持于大内一线。此时，我中央军各部正沿平汉路迅速向北推进，沿途消灭了石友三的后方部队，越过石家庄、正定后，对敌展开大包围；东北军另一部主力王树常部亦由沧州向河间、肃宁前进，威胁石友三部右翼。

石友三起事后，非但韩复榘不肯响应，就连有约在先的孙殿英和晋军孙楚部，也龟缩不出，石氏一支孤军在中央军、东北军优势兵力合围下，四面楚歌，势难再战，不得不放弃原来作战计划，决定将全军撤过滹沱河，经束鹿、衡水、枣强向山东德州突围。是时连日暴雨，滹沱河水深丈余，石部官兵争相渡河，秩序大乱，所有重武器和汽车辎重均被遗弃，人马亦淹死很多，几乎溃不成军。中央军和先后尾敌而至的东北军各部于8月2日紧紧将敌主力包围在滹沱河以南、深泽所属地区，未经激烈战斗即将其余部缴械。石友三仅率残众数千人逃赴山东，依附韩复榘去了。

此次讨伐石友三之役，前后尚不及半月，即全歼石部

六万余人，战果可谓大矣。但因石友三之变，东北军主力相继调入关内，致使东北防务空虚，遂给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可乘之机，这却是始料不及的。

讨伐石友三的战斗刚刚结束，部队尚未来得及休整，忽闻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联合桂军准备进攻湖南，第2师奉命星夜出发乘火车开至湖南醴陵，积极作战斗准备。

此次宁粤对立起因于胡汉民先生被软禁一事。中原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和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先生在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等问题上发生尖锐意见冲突。蒋先生为排除党内反对意见，竟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氏幽禁于南京汤山，随即强行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并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

胡汉民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已故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的亲近助手，素有声望。他被软禁后，举国哗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也愈加激化起来。一向在政治上较接近胡汉民先生，且又有个人野心的广东实力派人物陈济棠，以为有机可乘，乃公开打出反蒋旗号，于是南京反蒋人士纷纷南下广州，联合桂系李宗仁及汪精卫的改组派，组成了第2次反蒋联盟，国民党由此陷入了新的分裂之中。5月28日，反蒋派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并策动两广军队分三路进攻衡阳，与在湖南的中央军形成武力对峙状态。

正当国民党内各派系忙于内争之际，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事变，以武力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下，宁

粤双方不得不放弃武力手段，同意以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此后，宁粤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并分别召开了国民党四中全会（汪精卫召集一部分从广东分裂出来的反蒋人士，另外在上海也召开了汪记四中全会）。同年12月15日，蒋介石先生迫于反蒋派系的强大压力，第二次通电下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但孙科在国民党内并无雄厚基础，他的内阁困于财政和外交危机，维持不足一月便夭折了。次年元月，蒋、汪再度合作，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院长，蒋先生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氏军权在握，由此重新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

宁粤息兵之后，第2师奉命经平汉路运赴河南信阳以东地区剿共。这时第2师师长已由楼景越接任。此公待人苛薄，与部属关系多很紧张，我亦不喜其为人，加上当时我正患严重的肠胃病，骨瘦如柴，不堪再受征战之辛劳，乃决计离开第2师。我向上峰请了病假，未随部队开拔，转由武汉去了南京，打算在那里谋个闲职，休息一个时期，治治病。在南京，见到了刚刚升任首都警卫军军长的老上级顾祝同将军。顾氏见到我十分高兴，马上委我任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到任不到两月，楼景越将军改任第88师师长，所遗之缺由汤恩伯充任，顾祝同乃以第2师老师长的身份，向蒋委员长保举我任第2师独立旅旅长。我因在该师中征战多年，对之感情颇深，更兼感谢顾将军的一番美意，故不待身体完全康复，便抱病赴任去了。

我指挥的这个独立旅，并非第2师的老班底，所辖三

个团，除了一个补充团（第2团）外，其余两团一为黔军部队（第3团），一为陕军部队（第1团），内部成份很复杂。当时部队正在河南与红军作战，我无暇他顾，到任后只是维持局面而已。

五、进攻鄂豫皖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但国民党最高当局不顾全国各界民众“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强烈要求，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企图通过国联以外交手段调处中日冲突，同时却调集大批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根据地，不惜以武力手段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屈服于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于1927年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规模较大的暴动，以后虽屡遭挫折，却相继开创了赣南闽西苏区（即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十余块革命根据地。1928年至1930年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忙于二期北伐和内部争斗，无暇他顾，中共遂在南方各省活动区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其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中共势力的壮大深以为患，故在中原大战之后，即把围剿红军视为当务之急，调动大军加紧进行“剿共”战争。

鄂豫皖苏区是当时中共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地理位置亦极为重要。自1930年冬至1931年夏，驻鄂、豫、皖三省的国民党地方军队曾两次“会剿”当地红军，但都失

败了，且损失惨重。1931年9月，蒋介石先生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十五个师的优势兵力，发动了对活动在这一区域的红四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

国民党军队仍旧采用以往实行的分进合击战术，分由东、南、西三个方面进攻鄂豫皖苏区，企图将红军一举聚而歼之。其兵力部署大致是：第2师汤恩伯部、第12师曾万钟部、第58师陈耀汉部、第45师戴民权部和独立第33旅等共四师一旅兵力，由鄂东南地区推进，沿商（城）、潢（川）和商（城）、固（始）之线，并南经商城以南的亲区、麻城东北区至麻城一线布防，将鄂豫皖苏区一分为二，切断鄂豫边与皖西红军间的联系；第30师彭振山部、第31师张印湘部、第33师葛云龙部、第69师赵冠英部、第44师肖之楚部、第48师徐源泉部和新编第13师夏斗寅部共七师之众于鄂东地区向东进击，期与驻商、潢、固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合击鄂豫边红军主力；第46师岳盛瑄部、第55师阮肇昌部、第57师李松山部、第7师厉式鼎部共四个师兵力进攻皖西红军。此外，第4师徐庭瑤部、南京警卫师俞济时部等分由河南、南京调至武汉，张钫将军的第20路军亦向河南信阳集结，积极做增援准备。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几面围剿，红军采用了独特的打法：瞅准南线国民党军队番号虽多，但多为杂牌部队，号令不统一，战力较弱的弱点，乘“剿共”大军云集、尚未合围之际，仅留少量兵力在豫东南和皖西地区游击，主力则大胆跳到外线，突然包围了南线国民党军队最突出的重要据点黄安（今红安）。驻守黄安县城的是第69师赵冠英部。该

部为杂牌军，战力较差，一被包围即惊慌求援。红军却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一面加紧围困黄安，一面以有力部队先后歼灭了前来增援的第30师一部、第33师大部，吓得其余援军再不敢轻进，红军得以从容攻克黄安县城，全歼第69师，俘师长赵冠英以下五千余人。此役不仅使红四方面军在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也迫使南线国民党军队失去进攻势头，暂时解除了这一方面对其的威胁。

红四方面军在南线得手之后，很快将主力转到北线，并调活动于皖西的红军一部西进，会攻商城，意在使其鄂豫边和皖西根据地联为一体。

我正是在这前后由南京回到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的。到任伊始，即闻红军已控制了商潢公路，并切断了固始与商城之间的联系，固守商城的第58师连连告急。

大约在1932年元月下旬，第2师奉命由潢川沿商潢公路出击，以解商城之围。时天降大雪，部队行军困难，前进至豆腐店地区即遭到红军顽强阻击，激战一日无大进展。当日黄昏，部队正准备在阵地上宿营，师部忽然传下命令，要各旅调换阵地。我心里有些奇怪，担心天黑以后，部队在阵前频繁调动，很容易发生混乱，特别是红军擅长夜战，万一发动突袭，后果更难料想。无奈军令难违，只能遵令执行。果不出所料，我军正调动间，红军乘机发动有力攻击，部队立足不稳，相互又联络不上，一时大乱，很快全线崩溃，大部仓皇退回潢川。红军穷追不舍，一直追击到潢川，经拼命抵抗始守住该城。翌日，我们在第12师配合

下重新反攻，才击退红军，将前一晚来不及撤退而困守于几处小高地的汤师长和少数部队接应回来。而防守商城的第58师见增援无望，先已丢下所有辎重和重武器，连夜弃城突围，逃往麻城去了。

这一仗因汤恩伯指挥失度，使北线国民党军队遭到严重挫折，连号称中央军精锐的第2师也损兵折将，几溃不成军。南京中枢闻讯十分震惊，下令将汤氏改调他职，由黄杰将军接任第2师师长，同时命将第2师重新整顿，独立旅被编散，我改任第5旅旅长，辖第9、10两团。

3月下旬，红军乘战胜余威，主力东出皖西，于苏家埠、韩摆渡一带又接连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万余人，连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也被生俘。就这样，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了。

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这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原因有三：

第一，中共在苏区实行土地革命，获得广大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苏区作战，红军处处有老百姓的支援，不仅能及时获取情报，并随时得到充足的给养和人员补充，好似鱼游大海，活动从容自如。而国民党政权维护的是占农村人口中极少数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力图保持中国农村传统的封建统治，并把苏区广大农民刚刚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土地重新剥夺回去，这就必然遭到贫苦农民的坚决反对。尤其是一些反动地主武装，横行不法，无恶不作。国民党正规军每攻取一地，他们便随之大肆烧杀，反攻倒算，便更激起了农民群

众对国民党政权的刻骨仇恨。所以国民党军队一进入苏区，各地百姓纷纷“跑反”，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国民党军队在苏区转来转去，既找不到红军的踪迹，又得不到粮食，还常常遭到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的骚扰，犹如瞎子、聋子一样乱撞，最后被红军各个击破。

第二，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官兵普遍厌战，也是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像第2师这样的老部队，自北伐以来久经征战，在国民党军队中亦属劲旅，但与红军作战，居然一战即溃，固然是指挥无能造成的，但与官兵士气不足也不无关系。当时举国上下，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正当我们在鄂豫皖地区参加这次令人头痛的“剿共”战争的同时，蒋光鼐、蔡廷锴将军指挥的第19路军和张治中将军指挥的第5军，却在淞沪地区英勇抵抗日本军队的疯狂进攻，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称赞。两相对照，连我们一些中高级军官都感到内心惭愧，至于下级官兵受到的心理冲击就更大了。尤其是在他们亲眼目睹了苏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反感，并遭受到红军沉重打击之后，情绪更为沮丧、低沉。这种情况，在当时参加“剿共”的军队中普遍存在，因而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力。

第三，国民党军队在“围剿”苏区的过程中，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暴露出很多弱点。由于主要部队大多分守一些点线，力量过于分散，机动兵力不足，加上各作战区域之间、各部队间指挥不统一，行动不协调，因而形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终为红军各个击破。譬如，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鄂东黄安“围点打援”，前后达四十余日。这时

留在鄂豫边和皖西的红军很少，但这两个区域的国民党军却按兵不动，未采取积极行动来策应南线作战，以至坐失战机。待红军解决了南线战事掉头北上时，北线、东线的国民党军队只有招架之功了。这是这次“剿共”战争失利的直接原因。此外，红军作战之勇猛，战术运用之灵活，也是国民党将领们始料未及的。国民党军队习惯于正规作战，面对红军采用的“飘忽战略”简直束手无策。红军主力忽而东，忽而西，神出鬼没，你大军到时，他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待你兵力散开搜索时，他会突然集中兵力吃掉你一股或几股，让人防不胜防。汤恩伯将军离开第2师前，曾与我私下谈话，不得不承认“天下最困难的事情是与共军作战，实在令人头疼”。红军官兵作战的勇敢程度也令人惊叹。他们装备低劣，火炮更少，但打起仗来却不怕死，不仅防御顽强，攻击尤为凶猛，冲锋时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挡。国民党军队中一些战力稍差的部队，往往在野战中被红军一冲即垮。我那时在第2师已有多年，也打过一些硬仗，但像红军这样勇猛的强劲对手却极罕见。所以国民党军队虽然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但在战略战术、作战意志和战斗作风方面则逊于对方，这也是失败的原因。

南京中枢不甘于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惨败，1932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匪”军事会议，积极策划新的、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6月，蒋氏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指挥四十余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苏区。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基本战略是：利

用中共各根据地彼此隔绝、联络不易、配合较差的弱点，逐次转移进攻重点，以实现各个击破的军事目的。首先集中兵力“进剿”湘鄂西、鄂豫皖两个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俟其孤立再最后图之。同时，贯彻蒋先生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化地方政权，整顿民团，编组保甲，企图以政治手段瓦解苏区。

国民党军队除以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红军外，调动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余万兵力，另附部分空军，分成多路纵队，全力进攻鄂豫皖苏区。其中以陈继承将军的第2纵队（辖第2、第3、第80、第58、第88等师及骑兵第13、第15旅）出广水向宣化店、七里坪进击；以卫立煌将军的第6纵队（辖第10、第83、第89等师）由花园向河口出击。以上是进攻的主力。此外第3纵队马鸿逵部、徐庭瑶纵队（番号记不清了）、第1纵队张钫等部也分由平汉路以东、皖西和豫南进攻。

这次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吸取了上次分兵“进剿”，互不协调而被各个击破的教训，转而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新战术，一面进攻，一面巩固，力求以优势兵力合围红军主力，将其击破后再并进直追，四面堵截。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大致是：由东西北三面进攻，占领鄂豫皖苏区中心区域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地，使红军无法立足，迫使其由东南方向退往长江北岸而歼灭之。

7月初前后，各路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鄂豫皖苏区发动进攻。时红四方面军主力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

独立第1师正围攻麻城，与守军张印湘部激战，相持难下，故国民党军队在东线、北线和西线的进攻颇顺利。至8月6日，第2纵队第80师在宣化店、大胜阁、杨桥一带遭到一支约数千人的红军部队的顽强抗击，经一日激战后，红军主动向东南方向撤退，该师于当晚占领宣化店。第2纵队主力随即迅速向七里坪、黄安挺进。时卫立煌将军指挥的第6纵队也已进抵河口，正由西向东疾进，直取黄安。在这种情形下，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去麻城之围，将主力匆匆调至黄安以西，迎击卫立煌部。

8月11日至13日，卫立煌将军指挥该纵队第10师、第89师在黄安以西冯秀驿、东岳庙一带山地及高桥河一线与红军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均伤亡惨重，形成对峙状态。此刻第2纵队正不断排除红军阻击部队的顽强抵抗，节节向前推进。本旅于13日午在笔架山、灯龙山一带山地突破红军的抵抗，当晚率先进抵白马斯河一线。红四方面军为避免后路被抄袭，乃将主力转到七里坪，迎战第2纵队陈继承部，卫立煌部乘虚攻占黄安。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到七里坪后，沿倒水河布防，其第10、第73师居中防守悟仙山；第11、第12两师控制酒醉山一带；独立第1师和少共国际团在悟仙山南麓，控制古风岭。红军的作战意图是全力打垮陈继承部，彻底解除后顾之忧，再调头对付卫立煌部。

15日拂晓，第2师奉命发动全线进攻。本旅担任主攻，由周田渡过倒水河，正面攻击红军之悟仙山阵地；第6旅在本旅右翼经小明家、双河口渡河向古风岭进攻；第3师

第9旅向悟仙山北麓进攻，从左翼配合本旅正面进攻；第4旅为师预备队。

战况非常激烈。本旅第10团和第9团一部在火炮掩护下，向悟仙山一线发动猛烈攻击。红军虽然装备低劣，但打得极为顽强，寸土必争。双方在悟仙山东侧展开了一次次剧烈的冲击与反冲击，有几次我攻击部队已接近山顶，但很快被红军以肉搏战反击下来，彼此伤亡甚重，本旅第9团团长刘启雄负伤，两团的营连长阵亡多人，我平素很器重的一个迫击炮连连长也被打死了。

激战至午后，我已将手中掌握的预备队全部投入攻击，但战斗仍处于胶着状态。下午四时许，红军集中第10、第11、第12、第73及独立第1师等五个主力师突向本旅发起强大反击。红军大部队漫山遍野向我攻击部队两翼冲杀过来，杀声震天。本旅官兵经半日激战，已经精疲力竭，伤亡惨重，实在无法抵御红军强大兵力的冲击，只好且战且退。在我紧急请求下，黄杰师长命令本师第6旅第11团加强倒水河西线阵地，并派第4旅第8团跑步增援本旅。同时，第3师第9旅第17团也向南延伸，策应本旅战斗。但红军攻势凶猛如故，约下午五时许，本旅正面已经动摇，不少官兵溃退到倒水河边。我见情况危急，即命刚刚增援上来的第8团团长杨少初率部迅速投入战斗。命令下达后，却半晌不见部队行动，亦不见杨团长踪迹。正焦急间，左右向我报告说，第8团已经溃散，杨团长去向不明。我大吃一惊，原来杨氏刚到任不久，与该团一些军官不和，故在紧要关头部下不服从指挥，擅自撤退，杨氏见情况不妙，竟

也跟着逃命去了。

我虽征战多年，这种情况却还是初次遇到，简直气昏了。这时前面部队已经完全瓦解了，在红军追击下乱糟糟地溃退下来。起初我还竭力组织溃散官兵就地抵抗，无奈兵败如山倒，溃兵们只顾逃命，根本无法掌握。不多久，红军就逼近了旅部，几名传令兵见大势已去，不由分说地挟我上马，与旅部人员一起随着部队向后溃逃。我们刚一离开，红军就冲进了旅部驻地，高喊“缴枪，缴枪！”，倘再迟一步，我就成了红军的俘虏了。

晚七时，在倒水河西线的第11团也被红军击溃，团长周良阵亡。红军趁势越过倒水河，全线向我纵深追击约八、九华里，直抵白马斯河一线。黄杰师长亲率第4旅第7团及特务连工兵营等直属部队占领白马斯河东北高地固守，打退红军多次进攻。以后陈继承将军率第3师主力增援上来，与红军激战终宵，始将阵地稳定下来。次日黎明，红军主动撤退了。

此后，双方在倒水河两岸继续对峙了两三日。这期间，第2师重新进行了整顿，第8团因作战不力被编散，该团团长杨少初亦以临阵逃脱罪被宣布枪决（后闻黄杰师长将其偷偷释放了）。本旅（第5旅）番号撤消，改为第4旅，所辖第9、10两团的番号改为第7、8团。原第4旅之第7团改为师直属团。

8月18日，第2纵队各师继续向红军扼守的悟仙山一线阵地发动进攻。经激战，第80师、第3师分别于当日占领悟仙山、酒醉山。时北路第1纵队张钫部正向红四方面

军总部所在地新集挺进，第6纵队卫立煌部亦由南路向七里坪迫进，红军面临被合击的危险，遂向新集西北的胡山寨转移，企图打击北路战力较弱的张钫部。

根据情况变化，“进剿”鄂豫皖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重新调整了部署：中路军副总指挥刘峙亲自指挥第1纵队主力驻潢川一线，堵击红军北进；另以第6纵队有力之一部向红军左翼包抄，并调第1师胡宗南部、第13师万耀煌部分分别在豫南罗山和鄂东黄安集结；第2纵队则转进至宣化店集结，向红军右翼攻击。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胡山寨及附近地区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数日，处于四面围攻之中，势难立足，乃于9月中旬前后相继放弃新集、商城，撤离豫东南地区，向皖西地区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刚刚在皖西金家寨与红25军会合，第6纵队卫立煌部即追踪而至。红军放弃金家寨，继续向霍山、六安方向转移，又遭到徐庭瑤纵队的堵击，乃掉头南下，攻打莫山，未克，遂又分路东进，向黄麻地区转进。

蒋先生发现红军转来转去，又转回鄂东，急令西线的第1师、第88师、第13师分由平汉线经河口、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阻截；令第2、第6纵队继续尾随红军之后，穷追不舍。

红四方面军进入河口以东及冯寿二地区后，即与西线国民党堵截部队遭遇，激战后红军向黄柴畈转移。这时第2纵队先头第2师已经赶到，本旅因担任前卫部队，故先与红军隔河交火。稍后，师直属团也抢占了本旅右翼一处高

地。几小时后，红军突然组织强大兵力发动凶猛反击，战况极为激烈。据守右翼高地的师直属团阵地几度危急，激战中有的官兵竟惊慌得将手榴弹未拉弦就抛了出去。以后黄杰师长亲自赶到第一线阵地指挥督战，部队总算勉强守住了阵地。

这时各路国民党军队正纷纷向红军步步进逼，为避免遭到合击，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于10月10日左右向西经四姑墩、夏店突围，随即在广水以南越过平汉线向西转移。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屡经艰苦征战，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另在川陕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我所在的第2师因长期作战，屡受红军打击，损失较大，故红军主力西越平汉线后，即奉命调赴河南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我的第4旅驻于洛阳。

从国民党军队大举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战争，到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苏区，前后历时三月余。其间红军虽在一些局部战役中迭获胜利，但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这块老革命根据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民党方面看，为进行这次“剿共”战争做了精心准备。蒋介石先生先后调集了四十余万军队，其中许多是中央嫡系部队，如用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第1、第2、第3、第4、第9、第10、第80、第83、第88、第89师等部，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师。与红军相比，国民党军队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均占绝对优势，这与前三次“围剿”有很大不同（以前主要是使用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战术上做了较大调整，再加上蒋

先生亲自指挥，号令统一，各部行动比较协调，作战也较以前更为积极，使部队不易像以往那样为红军各个击破。从共产党方面看，当时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根据地内部不很稳定，红军实力亦受到削弱。在军事上，红军也未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大胆实施外线进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灵活战术，致使自己在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四面围追堵截下穷于应付，无法掌握战役的主动权。现在回顾起来，在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围攻麻城确属下策。红军主力在麻城及附近地区前后逗留月余，忙于“围点打援”，国民党军队乃趁虚由东、西、北三面深入苏区中心区域。待红军察觉到情况严重，匆忙调主力北上迎敌时，国民党军队合围已成，红军很难再有合适的战机和充足的时间来打垮或消灭某一路敌人，亦难寻找缝隙从容突围。而且，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之后，又企图用打硬仗的方式，首先消灭或打垮国民党军队一部主力，一举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固然为情势所迫，但其设想也是不现实的。依红军当时的兵力、火力和敌情条件（各个主要作战区域的国民党军队相距甚近，可以随时相互策应），似无把握一下子吃掉国民党军队几个精锐主力师。因而红军虽一再变更打击目标，并在七里坪等地取得局部胜利，却因力量有限，未能取得所期战果，自己反而受到严重消耗。这些都是红军此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的原因。

六 悲壮的长城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我东北三省后，亡我之心有增无已，为实现其预谋已久的所谓“大陆政策”，即谋进一步侵略华北，不断向南进逼。1933年元月1日，日本关东军向山海关发动进攻，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将军率守军奋勇抵抗，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出动的兵力大约有三个师团左右，分四路向热河进攻：由绥中沿北宁路向山海关正面进攻；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由开鲁向赤峰进攻；由林西向多伦进攻。其第三、四两路计划先会师热河省会承德，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元月3日，山海关守军安德馨营全部壮烈殉国，日军侵占该关，不久又相继攻陷九门口、石门寨。日军鉴于在山海关方面受到何柱国部的激烈抵抗，乃以主力改道直趋热河，于2月下旬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驻守这些地区的东北军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即纷纷溃退，连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战略要地黄土梁子阵地也不战而自动放弃了。热河省主席、东北军高级将领汤玉麟闻前方败讯，竟用汽车满载他的财产，仓皇退逃滦平，致日军于3月3日仅以百余轻骑占领了承

德。

日军大举侵入热河后，举国哗然。南京工人通电抗日，平、津等地各界也纷纷电请南京中枢对日宣战。南京国民政府此时正调动大军专力准备在南方各省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只是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迫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乃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仅派中央军第17军（辖第2师、第25师，以后又增派第83师）匆匆增援华北前线。

南京中枢的设想是，凭借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时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及其周围的险峻地势，死守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长城各口，阻止日军继续深入，争取时间进行国际交涉。据此命令第59军傅作义部守独石口；中央军第17军守古北口，原西北军旧部编成的第29军宋哲元部守喜峰口；第32军商震部守冷口。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地区担任防御，同时命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从上述军事部署上即可看出，南京中枢根本没有向敌人进攻以收复热河等失陷国土的决心，军事上完全是消极抵抗、被动挨打的架式。这种错误的政治、军事策略，再加上中国军队装备低劣，战力参差不齐，以及内部派系复杂、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等等，不能不导致了后来长城抗战的失败。

我所在的第2师于2月下旬接到命令：全师火速集中洛阳，28日开赴华北前线，限3月8日前抵达通县待命。驻徐州、蚌埠一带的第25师奉命提前两日，于2月26日开始输送，限3月5日以前在通县集中完毕。在湖北花园、孝

感一带的第83师，也于2月下旬集中汉口，3月上旬开赴洛阳（据说是为了对日军保密，故在洛阳绕道），3月20日前后到达北平附近，3月25日集中密云。此外独立炮兵第4团、炮兵第7团、骑兵第1旅、重迫击炮第1营及其他直属部队等，均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间，先后开到密云，统归第17军军长徐庭瑶将军指挥。

在全国民众掀起的抗日救亡热潮鼓舞下，我们北上抗日部队士气高昂，官兵们摩拳擦掌，纷纷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那几年间部队几乎天天忙于打内战，同胞间彼此残杀，我们都有一种厌倦心理。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机会，可以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大家的心情不由得为之振奋。我们这些人自不消说，连我的老长官徐庭瑶将军，本已奉命到江西上饶担任赣东北“剿共”指挥任务，这时也主动向南京中枢请求北上抗日，可见那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要求抗日的呼声已经愈来愈强烈了。

可是，由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对日采取妥协态度，缺乏抗日的决心和必要的准备，因而战争一开始就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境地。本来长城一带地势险要，我军倘若提前构筑坚固工事，加强纵深防御，并调精锐部队据险防守，则以敌人有限的兵力是很难突破我军防线的。但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此几乎丝毫未曾加以注意，更谈不上修建什么国防设施。部队匆匆赶到前线后，因阵地上多半是岩石，工具又很缺乏，已经无法也来不及修筑像样的工事，官兵们只能凭借祖先留下来的古老的长城，以血肉之躯来阻挡装备精良的敌人的进攻。同时，由于部队平日

训练都以“剿共”为目的，缺乏对日作战所需要的对空和对战车以及近代的筑城作业等训练，因而我军未战之前，即在日军飞机、战车、大炮等优势火力的狂轰滥炸下遭受到相当伤亡。更荒唐的是，一些部队在开赴前线时，连军饷、服装、武器等项尚无着落。譬如，第25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时，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该师只得临时在地方上借了十万元，部队才能开拔。当时北方还是冬季，尤其是古北口一带都为冰雪所覆盖，可我们的部队到达时，许多士兵还穿着草鞋，根本没有防寒服装，幸亏北平各界民众大力支援，始基本解决了部队的防寒困难；第2师由洛阳开到北平时，刚刚从仓库里领到轻机关枪，官兵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以前部队里只装备重机关枪，没有轻机关枪）；前线部队的粮秣补给也很困难，当时后勤部队卡车很少，勉强可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皆赖骡驼和牛车，一日行程不及八十华里。为了防空，运输都必须在每日下午五时至翌日晨六时间进行，其余时间只能在树林中隐匿，这样由石匣镇往返北平一次，大约需六七日，部队给养时有中断之虞，如此等等。当年我们的抗日将士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同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战斗的。

我第17军先头第25师开抵古北口前线时，长城战事正酣。日军占领承德后，以一旅团兵力南下喜峰口，另以主力一个多师团进攻古北口。原退集喜峰口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一经与敌接触即直溃口内，日军于3月9日占领喜峰口。这时调往该方面增防的第29军主力刚刚到达遵化，只有其先头第37师冯治安部黄昏时到达喜峰口。冯部乘敌

不备，利用黑夜以大刀队对敌实施逆袭，多有斩获，重新夺回了这一重要关口。第29军大刀队由此威名远扬，令敌胆寒。此后，日军一再进攻喜峰口及附近地区，均遭第29军各师坚决抗击，一时形成对峙状态。古北口方面，东北军王以哲部抵挡不住日军攻击，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军增援。我第17军先头第25师于3月9日夜到达古北口，但防守古北口第一线阵地的东北军112师张廷枢部已被日军击败，急于退走，竟于3月11日轻易将古北口险峻阵地丢失了。以后第25师曾举行全线反攻，企图夺回古北口，可惜未能成功，且有相当伤亡，该师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将军也不幸负伤，部队只好退守南天门及左右阵地。

先是，第25师开抵古北口之初，王以哲将军即要求该师迅速接替长城一带第112师阵地。第25师73旅旅长杜聿明等将领也认为王以哲部已兵无斗志，无法强留，即留亦不能力战。而且从地形上看，长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敌人；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因古北口南城地势低于长城，历史上是驻兵后方所在，形成一个小市镇，北关大，城内小，军事价值不及镇外的长城）。倘以第25师接防古北口将军楼第一线阵地，让第112师占领古北口以西、河西镇以北长城及八道楼子之阵地，使双方阵地正面缩短，互有依托，这样也能减轻第112师的压力，尚可使其多留几日。但关师长为图自保，坚持不肯接防长城第一线阵地，命令所部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两侧高地延伸，布置第二道防线。岂料在

第一线阵地的第112师仅留少数兵力监视敌人，大部擅自撤走，致使古北口阵地轻陷敌手。国民党军队各派系间不顾大局，各图自保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尽管由于举措失度造成我军在古北口初战失利，而广大官兵们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极其勇敢顽强的精神。当时第25师仅以四个步兵团独当优势之敌（日军兵力为第8师团和骑兵第3旅团），在既无坚固阵地可凭，友军又不肯协力作战的情况下，与敌血战三昼夜，毙伤敌二千人以上，自己也伤亡了四千余人。特别应当提到的是，3月12日该师第145团向南天门阵地转移时，前沿阵地有一个班的七名士兵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这七名士兵携带一挺机关枪，顽强据守日军必经的一个小山头，自动担负着掩护大部队的任务。他们前后毙伤日军百余名，阻击了敌人很长时间，为主力转移争取了宝贵时机。后来敌人恼羞成怒，竟出动飞机大炮对这个小小的山头反复轰炸，我七名壮士英勇殉国。日军对我军士兵坚强不屈的精神不得不表示钦敬，事后特将这七名士兵的遗骸埋葬在一起，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据说，日军起初并不晓得有中央军开到古北口前线，在遭到我军猛烈反冲击后尚觉惊讶，方知遇到强劲对手，遂不敢再轻敌冒进。

我第2师于3月上旬准时到达北平，补充了部分枪械弹药及粮秣、服装后，即奉命由通县向古北口前线进发。我率本旅走在前面，师部及第6旅随后跟进。

部队进入顺义县境，即听到前线炮声隆隆。在通往密云的道路上，不时有些东北军的溃兵稀稀拉拉地撤下来，从

他们口中了解到前线的一些情况。我求战心切，命令部队一再加快行军速度。

快到密云时，正巧我的军校一期同学、时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将军（原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将军刚刚引咎辞职，由何氏继任）少将高参的严武也从前线下来，一见面就向我说起前线情况如何如何坏，劝我不必上去了。我素闻此君胆小，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心想我们千里迢迢为抗日而来，哪有一闻炮响就向后转的道理？遂不理他，率领部队继续兼程赶路。

3月12日午夜后，本旅赶到距古北口以南约三十华里的军部所在地石匣镇。我顾不上休息，即去军部领受任务。身材瘦长的徐军长正与几位幕僚借着微弱的灯光察看地图，一脸倦容。见我进来，他走过来同我紧紧握了握手，算是打过招呼了，随即引我到军用地图边，很简洁而又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前线的情况很紧张，第25师已经打残了。有情报说日军正源源向古北口增兵，估计不久日本人的进攻将更为猛烈，现在命令你部即刻出发，务于天亮前接防第25师的阵地。”接着军部作战参谋又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一下前线敌我态势，以及作战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走出军部，已是凌晨一时许了。

我回到部队，马上集合全体官兵，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即下令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南天门疾进。虽然部队经过整日行军相当疲劳，但士气非常高昂，没有一人叫苦，也没有一人掉队。一路上安静极了，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轻微的武器碰撞声。部队排成整齐的纵队，犹如一

条长龙，在夜色中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地，悄悄地但又飞快地向前跃进。

凌晨四时前，我们就赶到了南天门。第25师代理师长杜聿明将军在阵地上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简洁地向我介绍了第25师的作战情况和日军的动态，还亲自带我借着微弱的月光巡视并交接阵地，直到凌晨五时，才与我紧紧握手道别，率部撤到后方休整。杜氏也是我的军校一期同学，彼此虽是初次见面，但他的热情和做事的精明、练达，却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我们竟成了莫逆之交。

第2师接防南天门阵地后，敌人正忙于调动兵力，调整部署，战场上暂时沉寂下来。这时，日军因在喜峰口方面屡受我第29军打击，无隙可乘，遂移兵古北口，企图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以达到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逐步控制华北的企图。自4月15日起，日军将滦东兵力逐渐向古北口方面转移，除原来的第8师团等部外，又相继增加了第6师团主力、第33旅团，并附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和战车等部队。而前线我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83师稍后开到）。据说徐庭瑶将军曾向南京中枢和北平军分会请求增调兵力，但得到的答复是：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要指望再增加援军云云。徐氏无法，只好下决心用仅有的这点兵力死守下去。

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的黄土梁起，左至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正面宽约十华里的中段以四二一高地为据点。本旅奉命担任第一线防御（第6旅一部守备八道楼子阵地），第6旅为预备队。鉴于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我们乘

战事间歇，加紧构筑阵地，阵地编成系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并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南天门阵地后方，还构筑了六道预备阵地。同时，各师还自发地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如4月5日，本师别动队在色树沟以短枪、手榴弹伏击敌人，毙敌骑兵第8联队军官一名、士兵数十名，并炸毁军车数辆。第83师的一支别动队，也袭击了古北口北关，给敌后方以沉重打击。4月11日，我各师别动队在敌左右两翼与敌激战，并将偏桥通承德的公路破坏，使敌后方补给断绝多次。敌人对我军小部队骚扰活动颇为头痛，当时日文报纸曾说我军在运用克鲁巴金战术云云。

4月16日至18日，日军出动飞机相继轰炸了第2师师部驻地石匣镇和第17军军部驻地密云县城。我判断这可能是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兆，遂命令部队日夜加强戒备，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血战。

就在这时，我南天门左翼险要制高点八道楼子（该处有古时八座碉楼，故名）却不慎失守了。八道楼子位于我军防线西段大拐弯处，是一个光山秃岭的制高点，地势极为险要，为南天门阵地左翼重要支撑点。且因八道楼子高出群峰，凭楼俯瞰长城外的古北口镇，了如指掌。谁占据此处，谁即可以火力控制古北口全镇，为兵家必争之地。军部原命令第2师派一营兵力防守八道楼子，但黄杰师长一时大意，认为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几座碉楼的，所以只决定派第6旅第11团的一个连防守。而这个连的官兵也以为地势险要，放松了警戒。4月20日夜，日

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偷袭过来，仅一夜之间，这八座碉楼就全部被敌人占领了。黄杰师长闻讯大惊，急将八道楼子失守的情况向徐庭瑶将军报告，徐军长极为震怒，在电话中严责黄氏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任怎样收复！”黄师长乃下令第6旅组织反攻，但均无效。次日又命令我率本旅第8团并指挥第6旅第11团继续反攻。我指挥部队由八道楼子东面五百米以外的光秃秃山坳上，在无地形掩蔽、又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向敌人发动了一次次仰攻，整整激战了一日，可惜仍未能成功。眼见一批批勇敢的弟兄冲上去，又相继倒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我五内俱焚。最后，我认为这样硬攻牺牲太大，而且没有成功的把握，只好请示上级忍痛将部队撤了下来，并于22日夜间将阵地变换到出庄小桃园之线。

4月23日晨七时，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射之利，以陆空军联合向我南天门阵地中央的重要据点四二一高地发动大规模猛攻。敌人的飞机、大炮、战车一齐出动，以密集的炮火覆盖我军阵地，接着以步兵群一波接一波地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我军官兵均镇静地伏在工事中不动，待敌接近至我前沿阵地二三十米处，突然以轻重火力集中扫射，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死伤枕藉。日军士兵受武士道精神毒害，且训练有素，作战很顽强，一批被打倒了，另一批又嚎叫着涌上来，几度冲上我军阵地，与我军官兵在工事中拼杀扭打，我急命预备队上去增援，方把敌人压了下去。

战斗中，我军因火力不够，也吃了敌人不少亏。我军

火炮很少，且性能亦差，往往需发射三发炮弹方能命中目标。但这里一发炮弹刚刚出膛，即为敌炮兵发现，马上招来排炮轰击，只好频频更换火炮位置，不敢集中排列作连续射击，故而大大限制了火力威力。敌人因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愈加骄狂，每次进攻之前，都以飞机大炮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阵地上几无一寸完好之地，官兵死伤甚重。最讨厌的是敌人的飞机，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盘旋轰炸，不断造成伤亡，并威胁我军补给线。当时我军没有防空武器，一些官兵愤极，就用肩膀扛着轻机枪朝着向我阵地俯冲的敌机射击，迫其不敢低飞。23日这一天，我军一共打退了日军四次疯狂进攻，阵地前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敌人溃退时来不及拖走的尸体。本旅牺牲也很大，一共死伤了三四百名官兵。

4月24日晨六时起，日军再度发动全线猛攻。敌人仍然采用老办法，先对我军阵地施以轰炸，摧毁我防御工事，再以步兵分梯队轮番猛攻。我军官兵沉着应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未失一寸阵地。战至午后，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攻势更为猛烈。第6旅第11团官兵伤亡过半，阵地被敌人突入，双方展开肉搏战，情形极为危急。黄杰师长急命补充团前往增援，遂将敌人打下去。

日军屡攻屡挫，恼羞成怒。4月25日，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对我南天门阵地实施报复性轰击。从晨至晚，敌人的炮击几乎终日未绝，不少士兵的耳朵都震聋了，但未见敌人步兵攻击。

此时第2师已与日军血战五昼夜，伤亡甚大，疲劳不

堪，遂奉命于4月25日夜间撤出阵地休整，由第83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守任务。

次日拂晓，第83师接防甫毕，敌复集中炮火向四二一高地猛轰，防御工事全被击毁；继以步兵猛扑，经该师第497团顽强抵抗，激战至下午，因伤亡太大，终于放弃了这一重要据点。

4月28日晨五时，日军集中火力向我南天门附近的三七二高地及四二五高地射击，其步兵分三纵队向我猛冲，同时以战车掩护骑兵威胁我左右两翼。第83师第497团及补充团的一营，与敌激战竟日，营长三员均负重伤，伤亡惨重，阵地工事完全被敌毁坏。因此于是晚变换阵地，占领南天门以南六百公尺的预备阵地。

自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血战了八昼夜。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和兵力顽强抗击几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给敌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日军“一星期内攻下南天门华军阵地”的预言，使战线仍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实为“九·一八”以来所少有，殊出敌预期之外。但我们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有两千名将士血染沙场。

这时日军已攻占冷口及其以东长城各口，接着多伦又告失守，整个战局对我愈加不利。

古北口方面，自4月29日以后，日军虽停止大规模进攻，每日仍以炮火向我阵地零星射击，时常以小部队向我袭击。

5月10日晨，日军重新发动进攻。大约五百余名步兵

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东头峪阵地进攻，被第83师第493团击退。翌日凌晨一时，日军第31、第32两个步兵联队约五千余人倾巢出动，向我稻黄店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用密集队形夜袭，战斗非常激烈。第83师的第493团及补充团损失极大。凌晨五时，日军战车六辆冲至上店子，威胁我军侧背。晨七时，日军又出动飞机八架在我阵地上空往复轰炸，协同其步炮兵攻击，双方形成混战状态。至上午八时，敌集中七十余门火炮协同两千余名步骑兵，猛扑我左翼笔架山阵地，第83师第494团拼死抵抗，鏖战至午，团长魏巍负重伤，中校团附江兴稼阵亡，官兵伤亡达三分之二。由于第83师各团均伤亡巨大，无法支持，遂导致全线崩溃，不得已撤至后方十华里的预备阵地。该师师长刘戡将军，以部队在一昼夜间遭到如此惨重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难当，企图拔手枪自杀，幸被部下及时救下。

这时，第2师正奉命开往后方整理补充。5月10日夜，我率第4旅已行至密云，忽接上级十万火急命令，说前线军情紧急，要我师各旅迅速回师增援。正在北平郊区休整的第25师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接到命令，我顾不上多想，急命部队掉头向南天门方向跑步前进。5月11日上午1时左右，本旅首先赶到阵地，接替了第83师的防务。我们喘息未定，日军即出动四五千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磨石山、大小新开岭、香水峪一带阵地大举进攻，并以战车十余辆，冲至白水涧附近，截击我后方的交通。此刻我后续部队尚未上来，本旅仅剩不足两千名的战斗员，兵力单薄，且经连夜行军相当

疲劳，在敌人疯狂进攻下，各处阵地均频频告急。我感到情况极其严重，手中又无兵可派，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只有拼命了。遂脱掉上身军衣，穿着白衬衫，提着手枪，带上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亲自赶到最前线往复督战，以示必死的决心。经过一天血战，总算守住了阵地，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上来的宝贵时间。

5月11日夜间，敌人又夜袭我小新开岭左翼四〇五高地，被我军击退，次日，敌复增加兵力发动全线进攻，第2师各团伤亡惨重，遂撤至后方七华里的新阵地。此时第25师第149团覃异之部尚在西北岭及下会之线与敌激战，支持至13日始撤至后方六华里的新阵地。

5月12日下午三时，日军攻占我大小新开岭一带阵地后，乘胜向石匣镇攻击，与我第2师在摇亭南香峪之线激战。傍晚，敌战车十余辆冲至南茶蓬我炮兵阵地，炮兵第4团第9连军官全部伤亡，炮四门被毁。同时我在潮河西岸的炮兵亦遭敌重炮轰击，毁炮二门。由于我炮兵受严重损害，火力间断，敌之战车更加活跃，激战至13日午，我军防线渐呈动摇之势。徐军长急命守潮河右岸的第25师，抽出一个旅向左翼延伸，占领后方八华里之新阵地，掩护第2师撤至黄岗峪不老屯之线。13日午后一时，第25师第73旅向左翼移动（此时该师第75旅仍在城子村小槽村原阵地与敌激战），该旅第146团未及占领阵地，即遭到优势之敌攻击。敌战车亦已越过石匣镇三华里许，冲至我南山口附近阵地。午后四时，敌炮兵向石匣镇集中轰击，掩护其步兵前进，石匣镇遂陷敌手。第146团在南山口与向南追击

之敌激战，死伤甚大，当日午夜退守后方六华里新阵地。

5月14日拂晓，敌步骑炮联合约二千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潮河右岸阵地攻击，其战车二十余辆由潮河滩上突进，与我第25师激战达三小时，后向石匣镇方向退去。同时我第2师在黄岗峪不老屯之线亦与敌小部队不时交火。

连日以来，第17军各师又相继死伤四千余人，损失兵力过半，如不补充，实无法再作有力之抵抗，遂奉令以第26军于5月14日夜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第17军除第25师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警戒任务外，皆调密云整理补充。15日各师开始移动，17日复奉命调回怀柔、顺义之线。第83师奉命担任北平城防。

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本侵略军恶战两月余，毙伤敌五千余人，自己也伤亡了八九千人，是当时长城抗战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地方。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还是使敌人初步认识到，中国军队是不容易对付的，中国人民是不好征服的。

我军撤退以后，当地一位姓张的道士，约集一些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我阵亡将士的忠骸掩埋在长城脚下，最集中的一处，在古北口镇西南，当地人称为“肉丘坟”，那里埋葬着五百余名壮烈殉国的抗日官兵。五十四年后，即1987年夏天，我和我的老朋友、原第25师第75旅第149团团长覃异之同志，重新来到古北口，凭吊了当年的旧战场和经过当地人民政府修缮了的原第17军抗日烈士合葬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山河依旧，而当年参加过这一悲壮抗战的人，已存者寥寥，我们两位也都是年

逾八旬的老人了。追思往事，怀念战友，真是感慨万端！覃异之同志当时曾赋诗二首，颇能表达我们这些幸存的抗日老战士的心怀，诗曰：

(一)

五年前血战地，
白头老将又重来。
长城依旧雄华夏，
倭寇而今安在哉！

(二)

当年喋血卫神州，
八载鏖兵报国仇。
古北口前怀战友，
中兴喜讯告坟头。

第17军在古北口方面失利前后，在滦河以东的中国军队亦相继撤守乐亭、迁安间滦河西岸，再向天津通县间北运河西岸撤退，使我喜峰口守军过于孤立，第29军遂奉命撤守通县城附近北运河西岸。日寇步步进逼，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这时北平方面正酝酿停战谈判。5月31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这样就进一步便利

了日本控制，吞并华北的企图，由此使我国面临着更加深刻的民族危机。而长城抗战，无数官兵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也就为一纸《塘沽协定》断送了。

七 江西“剿共”战争和西安事变

第17军从古北口撤下来后，都集中在北平及附近地区整理补充，我的第4旅就驻在北平城外的黄寺。

转眼到了秋天，经我的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肖忠贞先生介绍，我与陈碧莲小姐结了婚。当时陈小姐年方十七岁，是位聪慧秀美的南国少女，我们几乎是一见钟情。

不久，我奉命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学习。这一期学员不少是国民党军队中师旅级将领，不过高教班开设的课程却大多是中下级军官必须掌握的诸如营连排指挥，以及军事战术等项。过去我们在黄埔军官学校前后只匆匆学习了七个月，经过几年军事实践，现在再回过头来重新学习这些军事理论，感受确有不同。

在高教班里，我有幸与杜聿明将军再度重逢，那时他已任第25师副师长。由于彼此都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在古北口前线又有一面之缘，所以很快就熟识了。杜氏为人热情豪爽，肯于钻研，且处事果敢，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我在高教班受训前后有三四个月时间。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对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春，

我接到命令，要我即刻返部，率第4旅与第25师75旅一道去江西参加“剿共”战争，于是我提前结业，匆匆回到北平，不久即率部南下。

我们这两旅官兵抵达军委会委员长行营所在地——江西省会南昌时，受到蒋介石先生的检阅。这两支部队经过长城抗战的洗礼，再加上近一年的整理补充，战力得到恢复和加强，检阅时队伍严整、军容甚盛，蒋先生观后大为高兴，连声称好，还向官兵们训了话，内容大多是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剿共关系到革命军和国家成败生死”等那一套。

老实说，对于蒋先生的训话，以及那场“剿共”战争，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官兵是有些看法的。“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丢掉了东三省，现在又丢掉了热河，日寇正进一步蚕食华北，其狼子野心国人皆知。按常理，我们应当举国一致，共同对付日本人才是上策，倘无休止地打内战，骨肉残杀，岂不是亲痛仇快、自毁长城吗！尤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长城抗战期间，南京中枢仅派出区区三师中央军，而打共产党却不惜动用百万大军，难道共产党比日本人更可怕吗？不过，这些想法只能朋友间私下说说，无人敢公开讲，免得招惹麻烦。

我们在南昌仅驻扎了很短一段时间，便奉命开往前线。南京中枢对这次“剿共”战争几乎下了全部赌注，蒋介石先生亲任“剿共”总司令，先后调集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仅对江西中央苏区就投入了五十万军队。这在当时可谓是倾尽了国民党政权的全部军事力量。

为了彻底击败并消灭红军，国民党军队吸取以往“剿共”屡屡失利的教训，在军事上转而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战略，即在中央苏区四周修筑碉堡，一面修，一面慢慢向前推进，企图依托堡垒逐步前移，压缩中共根据地，先消耗红军力量，然后设法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为了困死红军，国民党军队还对苏区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禁止食盐、火油、药材、电器等物资输入苏区。

当时中共党内正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以强大兵力的四面“进剿”，中共“左”倾领导人放弃了红军以往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的机动灵活战术，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硬是命令红军“以碉堡对碉堡”，冒险地与装备、兵力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死顶硬拼，因而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本旅和第75旅开抵前线后，编入顾祝同将军指挥的北路军作战序列，在吉水、吉安一带负责守备第二线碉堡。

战争打的激烈而残酷，枪炮声从早至晚终日不绝。为了争夺某一阵地，双方常常投入大批兵力往复厮杀，彼此伤亡惨重，每天都有大量伤员源源从前线运下来。

这时已是5、6月间，江西的气候炎热起来，由于战场上众多阵亡者的尸体未曾认真掩埋，加上卫生条件太差，医药匮乏，以至军中疫病流行。我们这两个旅虽未直接参战，但不少士兵是新从北方补充的，水土不服，许多人发烧、腹泻、打摆子。起初我们以为是一般的疟疾，还不大注意，不

久就有人死去了，而且病倒的人愈来愈多，疫情蔓延得很快。短短几个月中，我这一旅官兵中竟有数百人染病不起，连从北方带来的一些拖炮、驮军用物资的骡马，也都死得干干净净。那时我的身体很弱，幸赖天天服用奎宁，才算平安地挨了下来。

到了1934年秋天，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艰苦作战，损失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无法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主力被迫撤出江西苏区，向湖南、贵州方向突围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主力突围后，我们奉命追击。此时部队减员较大，官兵体力甚弱，士气下降，大家都无精打采。部队冒着连绵的秋雨，走走停停，一路掉队的人很多，个别连队前面一个掌旗兵，后面稀稀拉拉跟着几十人，行军序列乱糟糟的，第75旅的情况似乎更糟。看到好端端的一支队伍，在“剿共”战争中被拖成这副模样，我心里既感到窝囊，又感到难过，终日郁郁寡欢。

就这样，我们从江西出发，几乎横贯湖南全省，连红军的影子也未见到，一路“护送”着红军走到芷江。经反复电请，上峰始准许我们返回北平，归还建制。命令传下来，大家普遍有一种被解脱的感觉。

回到北平，本旅奉命驻扎南苑。这时中日关系很紧张，日军屡屡寻衅，借机在华北挑起事端。我们意识到中日之间随时有爆发冲突的危险，乃抓紧补充、训练部队。

1935年6月，国民政府竟屈从日方压力，与日本再次签订了《何梅协定》。据此，中国政府被迫取消在河北的党

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仅由第29军宋哲元部驻防），甚至承诺撤换其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这协定比起两年前签订的《塘沽协定》，更严重地损害了我国主权，使我国蒙受了更大的屈辱。

根据《何梅协定》，中央军各部队必须撤出北平（因日本人痛恨第17军，连该军的番号也被迫取消了）。撤军命令下达后，大家心头都仿佛笼罩着厚厚的阴云。我辈身为军人，守土有责，现在却将不战而退出这座历史名城，实在愧对华北和全国父老！

撤离北平的前几日，黄杰师长请各旅、团部队长到他的住处吃饭。席间，他举杯沉痛地说：“今天请各位来吃杯告别酒，此番离开北平，尚不知何时才得故地重游啊！”言未毕，眼中涌出热泪，再也说不下去了。大家的心情同样伤感，彼此相对无语，默坐了半日方散去。撤军的那天，官兵们在操场上抱头痛哭，最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北平。当时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第2师撤离北平后，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这期间，本师重新组建了独立旅，以钟松（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为旅长。

次年秋，黄杰将军调任税警总团团长，由我接任师长。我接任不久，钟松的独立旅便奉调去四川与红军作战了。

我们在徐蚌地区前后驻防一年有余，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太平日子。

1936年底，国内突然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将军和第 17 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于 12 月 12 日凌晨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军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为著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内反响强烈，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由于南京中枢严密封锁新闻，人们无从全面了解事变的真相，一时各种议论纷起，情况极为混乱。各方面的政治势力和一些政客们，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都在四出活动。日本方面也乘机兴风作浪，对国民政府威逼利诱，施加压力，企图挑拨中国内战，从中渔利。中国政局在这一突发事件震撼下，更为错综复杂、动荡不安。

这期间，国民党内决策层围绕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和部分有影响的国民党元老力主武力讨伐；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等则主张与西安谈判，和平解决争端。讨伐派一度占了上风。国民政府于 12 月中旬对张、杨发布了讨伐令，并委任何应钦将军担任“讨逆军总司令”，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进攻西安。同时还出动空军轰炸西安附近地区。

根据我的记忆，当时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的军事部署大致如下：

东路：刘峙将军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 78 师董钊部、第 36 师宋希濂部、第 57 师阮肇昌部、第 79 师樊崧甫部、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及炮兵第 1、第 5 团

和工兵一团，沿陇海铁路西侧进攻西安；另以第10师李默庵部、第83师刘戡部由潼关进攻洛南、蓝田，威胁西安侧翼安全；我的第2师和第23师李必蕃部为东路集团军总预备队，集结于潼关附近。

西路：顾祝同将军任“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军胡宗南部由甘肃天水向宝鸡、凤翔进攻；驻宁夏吴忠堡的第25师关麟征部亦向固原、平凉地区挺进；另以驻汉中的第51师王耀武部经子午谷，进出于西安以南地区。

大约是12月16日，我率第2师到达潼关，这时中央军各部已基本完成了对西安的包围态势，一场新的内战迫在眉睫。

对于张、杨扣蒋兵谏的行动，当时我是不理解的。当然，我也知道蒋先生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有失人心，加上他一贯对非嫡系部队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利用他们做内战工具，因而导致了事变发生。但是出于封建正统观念，我还是认为张、杨二将军的做法是一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是作为部下所不应取的。那时我对蒋先生迷信很深，认定他是唯一能领导全国的政治领袖，所以他的被扣是国家的一大“不幸”。

不过，对于军事讨伐西安的行动，我的态度倒是有所保留的，恐因此而危及蒋先生的生命安全，也担心引发新的内战，使日本人有隙可乘。有这种想法的人在黄埔系将领中远不止我一人，故讨伐令下达后，许多将领并未真正准备大战一场，而不过希望以大军压境的态势，给对方造

成压力，迫使张、杨释蒋。

当中央军与张、杨所部在西安外围剑拔弩张、紧张对峙之际，南京的宋美龄女士和孔祥熙、宋子文先生等，也正在为营救蒋先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积极奔走。他们一面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内力陈和议，一面派澳籍顾问端纳先生飞赴西安调解。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变发生后仅数日，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即应张、杨二将军之邀飞抵西安。他们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积极宣传中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张、杨与蒋先生及宋美龄女士、宋子文先生等之间大力斡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后终于说服蒋先生基本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并使他承诺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一道抗日。不久，蒋先生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央军各部奉命撤回原防，我率第2师离开潼关，重新回到徐州。撤离潼关前，我专门置备了几桌酒席，与部属痛饮，庆贺蒋先生安然回到南京。当时我们既为蒋先生平安脱险而庆幸，也为消弭了这场内战战火而高兴，但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伟大意义，却还是认识不足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不深切感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那时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基本结束了连绵多年的内战烽烟，奠定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政治基础，为后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

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张、杨二将军，以及共同为事变和平解决而奔走努力的人士，都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卓越功勋，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张学良将军目前仍健在台湾。不久前，我从报刊上读到他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对往事的回顾，更深切地体会到他当时的抗日态度和爱国心迹，心中无比感慨和钦敬。